

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城市功能疏解的视角

胡苏云 肖黎春 (上海社会科学院 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要】城市社会治理既是地域概念又是公共管理范畴,特大城市功能集聚带来了城市社会治理更大的挑战:社会分层化挑战、基层社会治理、人口集聚及多元化挑战、空间治理、城市功能过度集聚挑战、社会服务、信息和资源集中挑战、技术和管理。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在未来要实现四个突破:第一是模式突破,实现三社联动升级;第二是空间突破,聚焦社区单元和社区综合体;第三是服务功能突破,进行社会服务跨区域合作和管理;第四是技术突破,建设智慧社区和智慧政务。

【关键词】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功能疏解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1 城市治理概念

城市社会治理概念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一种城市地域空间治理的概念,为了谋求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对城市中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实现整体地域的协调发展;其次是一种公共管理的概念^[1],城市治理必须基于主体间利益博弈均衡的诉求,进行关键因子的制度创新和长效机制建设,以建立治理的多元化和利益均衡机制。

瑞士政治学家皮埃尔(Jon Pierre)和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者盖伊·彼得斯(B·Gyypeters)都提出了四种城市社会治理模式,前者提出管理模式、社团模式、支持增长模式和福利模式^[2]。后者提出的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分为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灵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规制政府模式^[3]。良好的城市治理标准^①有六个,即发展可持续、权力下放、参与决策的公平性、提供公共服务、透明度及责任制以及市民参与。从管理走向治理的中国城市^[4]治理的基本要素有五个: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包含参与、有效、稳定、廉洁、改正等五大元素。

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有其自身特点,是城市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注重

整体性治理^②,形成八大趋势^③。本研究则主要从大城市功能疏解来分析特大城市社会治理。

2 大城市功能集聚带来城市社会治理挑战

2.1 社会分层化挑战基层社会治理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威望(社会标准)和权力(政治标准)^[5]。我国学者李强认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社会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由于社会资源的多元,造成了多种多样的层化现象,如因经济资源不同而形成富裕层与贫困层,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分成高学历和低学历群体^[6]等等。

中国的户籍制度被国内学界认为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市场转型及其较多流动机会并没有改变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的结构性影响^[7]。而且,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性也有影响^[8]。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空间已成为社会各利益群体激烈争夺的焦点领域^[9]。

针对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家庭结构等急剧变化,相应的需求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城市治理本质是城市主体之间博弈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为构建现代城市治理结构,必须基于主体间利益博弈均衡的诉求,进行关键因子的制度创新和长效机制建设,以建立治理的多元化和利益均衡机制,而且这种机制不仅是宏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4AZD026)

政策层面的,更要落地到基层社区,目前在北京、上海、杭州和成都等地的三社联动实践模式是个很好的开端。

2.2 人口集聚及多元化挑战空间治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同年龄、身份、地域、国别的人口流动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并越来越紧密地嵌入城市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从而形成城市新的多元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特大城市由于拥有更为强大的经济社会吸引力和包容力,使其人口多元化状况更加显著。北京和上海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外来常住人口已由2000年时的不足19%^[10]分别增至2015年的37.9%和40.6%^④。

人口多元化有利于知识和信息的交流碰撞,有利于促进大城市的创新发展^[11]。但随着城市化、全球化及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在“20世纪的全球标准城市化模式”主导下,由土地投机和房地产利益所驱动,迎合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过度移动性以及公共空间的过度私人化,加剧了城市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不平等,并在城市空间上呈现越来越显著的表现,出现居住、生活、消费等场所空间及人群间割裂现象。

特大城市功能疏解有赖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通过创新社会治理缓解社会矛盾,努力解决社会包容和多元融合的问题,从而聚焦如何在保持“流动社会”活力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高效并富有质量的服务,吸引全球优质人力资源^[12]。

2.3 城市功能过度集聚挑战社会服务

城市功能过度集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功能等诸多方面,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服务功能集聚和发达,但如果特大城市相对周边城市,以及特大城市中心区域相对边远区域而言,在养老、卫生医疗、教育、就业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保障功能方面所凸显过度集聚化,则需要适当疏解。

功能疏解包含特大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集聚化的疏解,由此涉及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效率与均衡性问题。奥菲尔德在美国大都市区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研究中指出,富裕的远郊区因为税基充足而获得了大都市区内大量的资源,而中心城市及近郊则远远不如,强调大都市区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缘于郊区化力量造成的“推拉”效应^[13]。奥克森分析了美国大都市区公共服务生产

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竞争能够降低公共服务的价格,提高公共服务资源供给的效率^[14]。

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客观上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差距越来越大,造成区域间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失衡^[15-17]。至于如何解决区域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王祖强等认为,转移支付保证不同地区的基层政府拥有提供大致相同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促进区域间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18]。胡祖铨等认为,地方政府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会降低其征税努力的程度,影响区域间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19]。马国贤强调,要按照公共服务最低公平标准增强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20]。樊丽明等通过对山东省3市16镇实地考察的研究,认为实现不同地区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的关键在于完善财政体制^[21]。上述观点都强调政府是实现区域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的主导作用,均衡配置内含着某些功能的直接疏解。

2.4 信息和资源集中挑战技术和管理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因信息和资源等过度集中而引发的“城市病”,诸如人口膨胀、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公共安全隐患日增等问题一直都困扰着特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人口多元化则极易造成不同人群、不同种族的文化和社会冲突,可能加剧社会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升级,危害城市安全,甚至大都市化解体,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美国学者佛罗里达自2002年以来持续强调的创意城市、创意阶层,蕴含着多元包容对于保证城市活力的价值,他先后开发了“同性恋指数”、“波西米亚指数”来刻画城市社会的包容度^[22]。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从另一个维度提出了“包容性城市”的概念,增加了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在参与和分享城市进步方面的内涵^⑤。上海大学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认为,随着人口多元化的发展,公共服务也不再是无差异的标准化服务,公共部门面临着如何在保持社会流动活力的基础上,通过高质量的社会治理服务,使多元人口与本地社会更好地融合的问题,以及如何使城市成为全球优质人力资源流动的核心中

转站^⑥。

城市社会治理的技术应对方案是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自2008年由IBM作为“智慧地球”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以来,迅速从构想进入实施。在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整体上已进入规划和建设阶段,目前在建的智慧城市已超过100个。我国90个试点智慧城市正在建设。辜胜阻等研究认为,发展智慧城市对城市的经济转型、居民生活方式变革、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建议智慧城市建设应高度重视差异定位,注重区域特色激发智慧城市发展活力,以市场需求引导项目建设^[23]。王静远等指出,大数据、数据活化、数据挖掘等数据管理、应用与分析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具有核心作用^[24]。赵大鹏着重指出了作为虚拟城市与实体城市融合的智慧城市所面临的风险将主要来自于实现的基础——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等,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可能风险进行了预警^[25]。

特大城市功能疏解背景下信息和资源集中化问题的提出,目的在于基于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需求导向的公共大数据,进一步强化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功能,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础,以“智慧城市”开启特大城市城市运行的升级版。

3 应对功能疏解的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针对前面的几大挑战,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在未来要实现四个突破:第一,模式突破,通过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由统一的机构一站式提供各类社会基本服务;第二,空间突破,消弭社会服务中的地域限制;第三,服务功能突破,通过疏堵结合的方法,集聚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在城市内和城市间的配置优化;第四,技术突破,不论是行政管理、空间布局、服务功能的创新,都需要有技术支撑来动态和及时地应对特大城市不断集聚、瞬间流动、人口多元、阶层分化的人群。因此应对特大城市功能疏解的社会治理创新策略可以归纳为:三社联动升级,空间、社会服务功能、技术三个要素提升优化。

3.1 模式突破:三社联动升级策略

“三社联动”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民办社工机构)为载体,以社工为骨干,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社会组织

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通过社工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

目前各地处于三社联动1.0版,即注重的是社区或社会服务—服务提供组织—服务提供人员三者之间的联动。三社联动1.0版的要特点一是社会和社区关联度有限,一般而言,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关注社会,而在社会建设中则会更多聚焦社区,而在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既需要有城市建设视角及社会大视角,也需要结合社会建设及社区视角,既需要关注人口服务和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又要关注社区微观系统的服务;二是目前的三社联动对于社会组织概念的理解有局限性,主要聚焦社会公益组织和社会团体,而对于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建设及其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领域的潜在作用及其功能发挥不够重视;三是目前对社会服务人员界定范围有限性,主要聚焦正式的社会服务人员,对于广义的社会服务人员体系构建不够重视,其实社会服务人员不仅包含正式的专业人员和社工,而且包括非正式的服务人员,兼职人员、临时工、小时工等,还包括家庭成员、志愿者等,社会服务人员体系构建对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大作用。

有必要构建三社联动2.0版,即从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发展为社区—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会服务人员体系。

一是从社区层面扩展到社会和社区兼有层面,同时关注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

二是从社会组织扩展到社会组织加社会企业、非营利机构,即服务组织形式要从单纯的社会组织到社会服务提供组织,形成公益组织和社团加社会企业、非营利机构。

三是从社工扩展到社工加其他人员构成的社会服务人员体系,形成社工—志愿者—非正式服务人员—兼职服务人员体系。

从社区服务层面看,三社联动的2.0版最终要形成社工—志愿者—非正式服务人员—兼职人员共同构成的服务人员体系,并成为社会复合主体功能实现的重要组织部分;这一体系也能更好地充实社会服务机构组织,如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

3.2 空间突破:聚焦社区单元和社区综合体

从国际上看,美国的购物中心越来越多地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26],摆脱了单一的大卖场式的购物功能,变身为城市社会机能中的关键一环,这主要体现在尊重并融入社区的氛围。市民选择自己所居住的社区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宗教、家庭、就业、教育、环境等。聚焦功能疏解的城市社会治理空间要素优化策略要聚焦社区单元,创新空间规划,建立社区生活圈和社区综合体。

一是聚焦社区单元,建立与多元人口结构相匹配的差异化社区配套。根据不同类型社区对设施需求的差异调整标准,规定刚性配套要求、弹性配套要求以及规划路径。重点关注若干类社区的配套需求,如对面向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中心城社区,重视对高层次服务需求的满足;对面向社会公平的保障性社区,以公共政策实现社区的机会平等与共享;对面向基本需求的流动人口社区,覆盖教育设施、医疗设施、行政管理设施等基本服务设施;对面向人文关怀的老龄化社区,以家庭养老为主,倡导社区照顾,关注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服务和社区交往需求。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来保障差异化社区配套和社区设计的实现。

二是通过“复合社区”,形成社区生活圈。“复合社区”就是要完善社区的就业功能和公共配套设施,缩短人们的平均出行距离,形成小范围、以步行及其他慢行交通为支撑的“生活圈”。通过在社区内建设较为完善的基本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营造复合功能的、适宜步行的社区环境,促使非通勤交通出行本地化。构建复合宜人的社区“生活圈”就是基于市民日常生活规律,实现步行15min可达的便捷社区生活圈,以其为单元组织设施配置与资源供应,保障居民享有人性化服务。

三是建设社区综合体,促进社区生活、就业、休闲的融合发展。以生活圈为单位开展社区规划探索,整合社区层面的各类规划和建设,并作为公众参与平台,推进社区多元共治。通过社区空间混合,建设社区综合体,成立社区规划师加以推进落实。参照美国大型购物中心转型的案例,对社区已有的购物中心进行转型升级为社区综合体,融合购物、社区服务和社会服务功能,综合体融合社区生活服务保障、创造多渠道社区就业机会,并营造有归属感的交往空间。

三社联动2.0版在空间上就是要通过社区单

元、社区生活圈和社区综合体建设来实现的。

3.3 服务功能突破:社会服务跨区域合作和管理^[27]

特大城市除了经济、政治功能集聚,还体现在社会服务功能集聚,功能疏解的直接手段是疏解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功能,如日本为纠正东京一极化、疏解过度膨胀和集中的首都功能,发展“地方创生”,近年正酝酿多个中央机关外迁^[28]。北京则考虑疏解教育和医疗机构等社会服务功能到周边地区。除了直接疏解功能,还需要带动和提升周边城市社会服务功能。

一是区域层面的提升策略,应逐步完善跨区域人口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联合供给模式,构建跨区域的组织管理机构,推动社会公共服务在区域内的有效合作发展。

部分硬件如义务教育类学校、文化设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供给在空间上是有限制的,难以进行跨区域的余缺调剂;但在软件中,如师资力量、医护人员等,可以通过轮岗或多点执业等方式扩大服务供给范围。因此,可以根据各项社会公共服务的特性,建立统一组织管理机构和跨区域的协调合作机制,实现区域内公共资源的灵活整合和优质资源的跨区域共享。地方政府间可以针对某一项公共服务,设立跨区域组织协调的日常办公机构,并在条件相对成熟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探索组建区域性的民间组织,利用非政府组织在促进政府合作中的纽带作用,实现可持续化的区域联动。在机制上可通过协商制定在专项服务上的合作协议和议事规则,以法律、法规等制度内容来约束各协议方共同遵守;探索针对某一项社会公共服务建立区域共同基金,实行利益补偿等制度创新,降低社会公共服务外部性对服务功能整合的阻碍,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于一些无法跨区域配置的公共服务资源,可以利用现代化的手段,例如MOOC线上课程、远程医疗方案指导等,实现优质资源在区域间的共享。

二是城市层面的提升策略,应明确特大城市发展功能定位,依据城市特点与优势提升城市竞争力,同时,城市社会公共服务配置应当以各城市常住人口为依据。

在配置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时,应当及时把握区域未来一段时间的人口变化趋势,进行各城市常住

人口数量、结构、空间分布的变化趋势预测,不同社会服务项目应当以享受该项服务的特定人群的规模和变化趋势为配置依据。例如,教育资源配置方面,不仅要依据相关年份的出生率来预估户籍学龄儿童的就学需求以及预测之后的初高中就学情况,也要考虑到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对流入地流出地的资源配置影响,做相应调整;养老社会保障方面,不仅要依据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的自然变化进行资源和服务配置,也要考虑劳动力大量流出所导致的流出地老龄化问题急速加剧,通过相应制度创新和区域合作手段,进行有效保障。更要依据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对社会公共服务,尤其是优质服务资源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规划。同时,应当依据各城市社会公共服务的短板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3.4 技术突破:智慧社区和智慧政务建设

智慧城市作为技术方面的发展战略,将引导未来城市治理。智慧城市建设有三个方向的趋向,一是为市民服务,二是为企业服务,第三是要建立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大数据技术助力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基于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需求导向的公共大数据,进一步强化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功能,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础。随着社会群体及其需求多元化的发展,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能够及时提供具有差异化、个性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基于智慧城市建设和公共大数据开发,重构公共服务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大数据及超级流量城市(硬件的更新和投入,应用系统、功能研发和超算工具的不断升级和延伸),可以为各类社会群体提供更精确有效的服务和管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夯实社会治理基础。

二是,优先建设智慧社区和智慧政务。智慧社区是社区建设的新理念,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组成部分之一。以物联网、SOA、云计算等技术为实现手段,通过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各类社区智慧应用系统建设,促进街道、小区公共服务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化应用,实现对社区基础设施、环境、居民生活等多种元素综合的智能化管理,不仅可以实现足不出户交纳“三费”(水费、电费、煤气费)、查询社保、购买商品等方便群众生活的服务,有效改善传统社区管理方式,更是解决城市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服务与社会需求脱节,扭转市场供给与服务需求偏好错位的捷径。

治理电子化的政策是智慧政务的主要形式,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电子化不仅是借助信息科技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与施政质量。它与政府的管理相关,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构建电子化政府,努力提高政府服务社会、管理公共事务,其最核心目标是实现智慧政务。

4 结论和讨论

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提高到70%以上,人口将进一步向特大城市集中,特大城市面临功能疏解的压力,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以三社联动的升级实现模式突破,以社区综合体的建设实现空间突破,以社会服务区域合作实现服务功能突破,以智慧社区和政务建设实现技术突破。

今后的研究中首先需要关注特大城市功能疏解的有效方法和手段,除了目前聚焦的社会服务功能,是否还需要有相应的经济服务功能和政府服务功能的相应适度疏解;其次需要关注功能疏解和功能效率提升之间有什么关系,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如何和空间突破、技术突破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功能疏解和功能效率的提升。△

【注释】

- ①一是城市发展各个方面的可持续;二是下放权力和资源,以使各项政策和举措更加符合众所公认的优先事项和市民的实际需要;三是公平参与决策过程;四是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效率;五是决策者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透明度和责任制,包括人人有机会获得信息和信息的自由流通、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实施应做到透明而具有可预测性、政府官员应始终保持专业能力和个人品德的高标准;六是市民参与和市民作用同时加强城市的包容性。
- ②即以公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的政府治理图式。
- ③更加重视权利保护,更加重视依法治理,更加重视多种手段综合运用,更加重视基层治理,更加重视互联网治理,更加重视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更加重视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加重视社会治理人才培养。
- ④北京市和上海市统计局数据,2016年。
- ⑤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之后将包

容性概念用于城市发展。

⑥2013年10月上海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联合组建成立了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围绕特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展开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专家认为,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公共服务也不再是一系列无差异的标准化服务,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公共部门有不同的服务预期,政府仅凭自身的力量无法及时回应。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公共部门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流动社会”的问题,“流动社会”紧密嵌入城市本地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必须考虑如何在保持其活力的基础上,使之与本地社会更好融合,如何通过高质量服务,使特大城市成为全球优质人力资源流动的核心中转站。此外,如何建立有效防范风险社会的治理机制,以及如何有效治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都是摆在政府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李继军,辜桂英. 基于人口发展新常态的特大城市治理研究——以上海为例[C]//中国城市治理论坛论文,上海交通大学,2015-10-23(24)。
- [2] Pieer J. Models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Urban politics [J]. *Urban Affairs Review*, 1999, 34(3): 372-396.
- [3] B. 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 吴爱民,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57.
- [4] 郭先登. 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伟大跨越[J]. 青岛日报(理论周刊),2014-03-16:4.
- [5]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第十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39-242.
- [6] 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
- [7] 陆益龙.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2008(1):149-162.
- [8] 洪岩璧,钱民辉. 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一个文献综述[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4):64-76.
- [9] 李强. 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1):1-9.
- [10] 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M].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6-9.
- [11] 王红霞. 中国特大城市人口多元化进程分析——以北京和上海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2013(3):28-35.
- [12] 李友梅. 国际特大城市治理的最新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0-21:4.
- [13] Orfield, M. Metropolitics: A Regional Agenda for Community and Stability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999, 28(2): 33-49.
- [14] 罗纳德·J·奥克森. 治理地方经济[M]. 万鹏飞,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5] 陈旭佳. 均等化视阈下中国区域间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2016(3):34-40.
- [16] 曾红颖.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体系及转移支付效果评价[J]. 经济研究,2012(6):20-32.
- [17] 吕炜,王伟同. 失衡、政府责任与公共服务[J]. 中国社会科学,2008(4):52-64.
- [18] 王祖强,郑剑峰,包浩斌. 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研究[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9,19(6):65-72.
- [19] 胡祖铨,黄夏岚,刘怡.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努力[J]. 经济学(季刊),2013,12(3):799-822.
- [20] 马国贤.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政策研究[J]. 财政研究,2007(10):74-77.
- [21] 樊丽明,石绍宾,解亚.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动态特征及问题探讨[J]. 财贸经济,2008(8):14-19.
- [22] Richard. Florida.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M]. New York: Roulledge, 2004.
- [23] 辜胜阻,杨建武,刘江日.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J]. 中国软科学,2013(1):6-12.
- [24] 王静远,李超,熊璋,单志广. 以数据为中心的智慧城市研究综述[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4,51(2):239-259.
- [25] 赵大鹏.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问题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1-27.
- [26] 张剑涛. 美国城市购物中心的转型和重生[R]. 全球城市发展动态周报,2014-10-02:1-2.
- [27] 曾蕴. 长三角公共服务均等化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43-70.
- [28] 丁蕾蕾. 首都功能疏解的东京样本:日本多个中央机关酝酿外迁.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7237?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016-03-23.

作者简介:胡苏云(1964-),上海人,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和社会保障。

收稿日期:2016-07-10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Megacity: Perspective from Function Easing

HU Suyun , XIAO Lichun

【Abstract】City governance is not only concept of area but also public management. Concentration of function of the megacity challenges social governance from various aspects: social stratification challenges grass-roots governance ,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challenges space governance ,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the city function challenges social service ,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concentration challenges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he future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megacity requires four breach: model breach which means update the linkage of 3S(social community-social organization/social enterprises-social service system) ; space breach means focusing community unit and community complex; service function breach means co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between areas; technology breach eans building smart community and smart government.

【Keywords】 Megacity; 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Easing

(上接第 36 页)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Testimony from 34 American Metropolitans

ZHU Ying ,TU Qi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can't live without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support of cit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itself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to a great extent. Based on the America metropolitan area industry data on the year of 2005 to 2014 ,applying location entropy and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America innovation c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using empirical study in the America cities to conduct and guide China's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global innovation city in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generally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ronger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ity the mor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formation industry has; (2)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ome innovative city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an the financial sector; (3) the similar degree of the global innovation c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weakened over time ,the global innovation city tend to develop urban economy depend on their location feature.

【Keywords】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Empirical Study; Location Entropy;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